

论台阁作家宋文观和宋诗观的错位

冯小禄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2)

摘要: 明初台阁作家和典型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异常的“错位”: 他们对宋儒宋文极尽褒扬, 纳入文统的重要位置; 而对宋诗则或漠视, 或否定, 态度全然不同。至其原因, 则既与于宋兴起的鄙薄宋诗的风气有关, 也与台阁体作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有关。

关键词: “错位”; 台阁作家; 宋文观; 宋诗观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5)06-0792-05

习惯指称的台阁体, 是指明朝仁宗、宣宗时期的“三杨”, 所谓的典型台阁作家, 而从内阁的制度渊源说, 明初的宋濂等人就已有内阁之名, 只是“犹未得位”^①罢了。他们都有极强的道统和文统意识, 如宋濂有《文原》上下篇、《文说赠王生黼》, 王祿有《文训》, 朱右有《文统》, 后李时勉有《文说》。深入分析这两个时期台阁作家的文统和诗统, 会发现一种奇怪现象, 就是他们对同属于宋代的诗歌和古文有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评价, 他们将宋文和六经、汉唐文一起纳入学习宗奉的统系, 而将宋诗排斥在诗歌学习和取法的系统外, 形成异常的“错位”现象。本文即对这一现象予以阐发, 以引起关注。

当然, 需先说明的是, 这种对宋文和宋诗的“错位”评价, 既不自明代始, 也不独明代台阁作家为然。对宋诗宋文采取区别评价的, 以南宋刘克庄为较早, 其《竹溪诗序》称: “迨本朝, 则文人多, 诗人少。三百年间, 虽人各有集, 集各有诗, 诗各自为体, 或尚理致, 或负材力, 或逞辩博。少者千篇, 多至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耳, 非诗也。自二三巨儒及十数大作家, 俱未免此病。”^{〔1〕}(卷九十四) 殆即有宋文乃本色而宋诗不当行之意。而宋诗又实际包含了苏轼、黄庭坚等引导的“负材力”“逞辩博”的文人诗和张载、邵雍、二程等道学家引导的“尚理致”的性气诗^②。金人王若虚更明确说: “扬雄之经, 宋祁之史, 江西诸子之诗, 皆诗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 诗则反是也。”^{〔2〕}(卷三十七) 崇宋文而黜宋诗。盖宋文自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以胸臆之韵为文和张

载等道学家以理道为文后, 已经得到了上自朝廷、下自大众的尊崇和实践, 而宋诗的命运则不同, 自它比较充分的展露出不同于唐音的宋调特色后, 苏、黄类的宋诗和理学家类的性气诗, 就不断受到包括宋人在内的鄙薄和批判(如四灵派、江湖派和严羽, 甚至包括朱熹), 而这种风气又在元代得到广泛延续, 并直接影响了包括台阁作家在内的大部分明人^③。

明初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存在着错位现象。

他们普遍尊崇宋文, 把它视为由六经、孟子、两汉到唐文的延承。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 其有多文谈及文统。《徐教授文集序》言: “夫自孟氏既没, 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谊)、董江都(仲舒)、太史(司马)迁得其皮肤, 韩吏部(愈)、欧阳少师(修)得其骨骼, 春陵(周敦颐)、河南(程颐、程颢)、横渠(张载)、考亭(朱熹)五夫子得其心髓。观五夫子之所著, 妙斡造化而弗违, 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斯文也, 非宋之文也, 唐、虞三代之文也; 非唐、虞三代之文也, ‘六经’之文也。文至于‘六经’, 至矣尽矣! 其始无愧于文矣乎?”^{〔3〕}(卷二十六) 他推崇宋代五位理学家超过了汉唐宋的文章家, 文章家中又更重视唐宋, 在他, 理学家得“六经”之“心髓”, 文章家中汉代仅得“皮肤”、唐宋得“骨骼”, 层面的不同和考语

收稿日期: 2005-08-23

作者简介: 冯小禄(1969-), 男, 四川大竹人, 云南师范大学讲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明清文学与文献。

的差异,透露了其渊源元末黄溍、柳贯的理学出身和重道轻文思想。当只谈文章家系统时,他也将“纪事之文”的汉和“载道之文”的唐宋别开,而不列入正式统绪。其《文原》云:“六籍之外,当以孟子为宗,韩子次之,欧阳子又次之,此则国之通衢,无榛荆之塞,无蛇虎之祸,可以直趋圣贤之大道。去此则曲狭僻径耳,胡可行哉!”^[3](卷二十六)。对宋文他更有“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的说法,推崇苏洵文“变化傀伟”、苏轼文“雄迈奔放”、苏辙文“汪洋秀杰”^[3](卷二十九《苏平仲文集序》)。刘基官至御史中丞,封诚意伯。其《苏平仲文集序》从享国长久和疆域广大的角度立论,表彰唐虞三代、西汉和唐文,称:“继唐者宋,而有欧、苏、曾、王出焉。其文与诗,追汉、唐矣,而汉、唐若有歉焉。”^[4](卷五) 贝琼明代官至国子监助教,其《唐宋六家文衡序》所叙文统从先秦孟轲、汉代扬雄到唐宋,称:“盖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得其体,以成一家之言,固有不可至者,亦不可不求其至也。”^[5](卷二十八)《欧阳先生文衡序》更将欧阳修视为“欲进于先秦、两汉者,亦无以过之矣”^[5](卷十九)的桥梁。朱右编有《新编六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之称雏形),其《文统》在历数先秦、汉、唐作者后,说:“宋欧阳修又起而继之,文统于是乎有在。”^[6](卷三)

与对宋文无保留的推崇相比,明初台阁作家对宋诗的态度就有些因人而异。先看以理学流而为文学的同属金华学派的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王祹《练伯上诗序》,其态度耐人寻味。与元末明初普遍的抑宋风气有所不同,理学气的浓厚让他们还正面论及宋诗,并不完全排斥,然这种推崇又有限度。他们分宋诗为四期论述:突出王禹偁、欧阳修、苏舜钦、梅圣俞等人对宋初晚唐体和西昆体“全乖古雅之风”的革除之功,引导“诗道中兴”;元祐后突出苏轼、黄庭坚的笼罩作用,称“苏黄挺出,虽曰共师李、杜,而竞以己意相高”;隆兴、乾道时突出尤、杨、范、陆四大家(王祹增加朱熹之冲雅^[7]),“然终不离天圣、元祐之故步,去盛唐为益远”;批判晚宋“气局荒颓,而音节促迫,则其变又极矣。”作为宋诗代表的苏黄受到了足够尊重,与汉魏的曹刘、唐代的李杜成为各自时段的代表,但“虽曰共师李杜,而竞以己意相高”和“去盛唐为益远”^[2](卷三十七)的评价,又表明汉魏晋和三唐在他们心目中才是学习的经典。这说明他们并不能完全超越从元人而来的“诗当取材于汉魏,而音节以唐为宗也”(杨仲弘语)^[7]的诗歌取法态度。

再看刘基和贝琼。刘基《苏平仲文集序》认为宋

代:“其文与诗,追汉、唐矣,汉、唐若有歉焉。”^[4](卷五)也能泛泛肯定宋诗。贝琼的宋诗观较复杂,元时他尚能肯定宋诗,称“宋诗推苏、黄,去李、杜为近。逮宋季而无诗矣。”^[5](卷一《乾坤清气序》)到明代,其诗歌观已经转变为诗教论,对宋元均持否定态度,甚至为肯定元诗“抑一代之诗有不可废”的文献价值,更把宋诗当成元诗之改革对象,“务铲宋之陈腐以复于唐”,与元、唐诗异类的宋诗遭到“陈腐”的批判^[5](卷二十九《陇上白云诗稿序》)。

明初台阁作家对宋诗这种不够统一坚定的态度,就为典型台阁尊崇汉魏盛唐诗而漠视宋诗的诗歌观埋下了伏笔。

二

典型台阁的宋文观和宋诗观错位更明显严重。

他们的文统与明初大体一致,实际也有两个系列:一是偏于文的文章家系统,即所谓“文学之士”系列,能“治经术,其言庶几发明圣人之道”的汉代董仲舒,能“力于文词,能反求诸经,概得圣人之旨”的唐代韩愈、宋代欧阳修、曾巩,就成了汉唐宋的代表;一是别立而杂入文统中的儒学系统,特别表彰宋朝周、二程和朱子能“笃志圣人之道,沉潜六经,超然有得于千载之上,故见诸其文,精粹醇深,皆有以羽翼夫经”^[8](卷首·杨士奇《颐庵文选原序》)。宋人在这两个系列都占上风。特别是和时受批评而显得成员不固定的汉代文人相比,宋代人员的构成更加稳定,基本上就是习惯称之的六家。即使在人们更习惯的只叙述文章家时,宋文仍人数众多。如杨荣《送翰林编修杨廷瑞归松江序》所开列的名单:“以谓三代而下,莫盛于汉唐宋,帝王之治虽曰有间,至于儒者,若汉之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班固,唐之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湜,宋之欧阳修、二苏、王安石、曾子固诸贤,皆能以文章羽翼六经,鸣于当时,垂诸后世。”^[9]欧阳修更受到了最瞩目的推崇,黄佐说:“(仁宗)恒谓士奇曰: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欧阳真不忝矣。故馆阁文字,自士奇以来皆宗欧阳体也。”^[10](卷十一)

宋文的受推重,还可从宋儒真德秀所编的《文章正宗》和《大学衍义》受青睐看出。《文章正宗》续编收录宋文,以欧、苏、曾、王为多。其编辑原则:“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其

目。”^[11]《卷首《文章正宗纲目》》受到典型台阁的推崇。杨士奇评论它:“非明理切用,源流之正者不与。盖前后集录文章,未有谨严若此者。学者用志于此,斯识趣正,而言不倍矣。”^[12]《《文章正宗三集》》程敏政编辑《新安文献志》也遵从真氏原则:“甲集悉遵西山先生《文章正宗》例,凡先达时文,务取其平正醇粹,有关世教者,否,虽脍炙人口,不在录也。”^[13]《大学衍义》更是受到皇帝和阁臣的推荐。朱元璋“览而悦之,令左右大书,揭之两庑之壁,时时睇观”,把它当做“帝王之学”^[10]《卷九》。杨士奇以为“大有益学者及朝廷,为君不可不知,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观《大学衍义》,则其为治苟而已。”仁宗取观,“大喜,曰:‘此为治之条例监戒,不可无。’”又“命翻刊以赐诸子”^[14]。到成化末年,理学名臣丘浚进《大学衍义补》,得到孝宗的赏赐和升官。

然在诗歌领域,典型台阁未能摆脱已形成深远流传统的唐宋诗之辨的束缚,仍视宋诗为唐诗的异类,对其存在比较漠视。叙述诗歌史时,他们常满足于只说明唐前情况,展现诗歌如何由《诗经》到汉魏晋再到唐这样的诗歌历程,至于在唐后的发展情况,他们似乎并不关心,也懒于提到。即使提到,也往往以宋诗的“理趣”和“议论”为话头,很少正面分析。而在不得不正面提到宋诗的诗话中,更有如周叙这样的台阁人物,对宋诗极其排斥。

周叙,永乐十六年进士,“在翰林三十年”^④,属台阁成员。承其父志,续编有《诗学梯航》。其《叙诗》描述的诗史坚持崇汉、魏贬六朝,宗唐抑宋。述及宋诗,几无好感,独称朱子《感兴》诗:

宋初言诗,犹袭晚唐。杨大年、刘子成等出,遂学温飞卿、李商隐,号西昆体,人争效之。其语多僻涩细碎,甚至不可省识。欧阳永叔欲矫其弊,专以气格为诗,其言平易疏畅,学之者往往失之快直,倾困倒廩,无复余地。其后黄山谷别出机杼,自谓得杜子美诗法,海内翕然宗之,号江西派。学之者不失之奇巧,则失之粗鄙,间有名世如苏东坡辈,又皆以己意为诗,不复以汉、唐宗祖。故宋之声诗卒复不振,独得朱子《感兴》二十章,幸有以纲维诗道,主鸣绝唱。逮末年咸淳之声出,诗之厄运已极,质之风雅,盖荡然矣。

有这样的诗史背景,在谈学诗方法时,一言就断绝了宋诗。其《通论》要求:“更须多阅经史,以为帑藏;深明义理,以为见识;熟玩《毛诗》《离骚》及汉、魏诸诗,以为根本;而取材于晋、唐。宜将宋人之诗一切屏去,不令接于吾目。使不相渐染其恶,庶得以遂

吾之天。不然,一沦于彼,虽竭大湖波,徒费煎涤矣。”^[15]宋诗被看成传染性极强的恶疾,最好的办法就是阻击传染源,不与接触,否则一旦受病,再难复健康之身。此番断言比前之刘嵩的“宋不足征”论更决绝!

而在评价时人的诗歌创作成绩时,他们也常以汉魏晋盛唐为话头,说某人古体似汉魏,近体似盛唐,而很少以宋代某人比之。此处以杨士奇的评说为例(见表 1)。

表 1 典型台阁作家诗学追求示例

作家	诗学追求	出处
虞谦	上追盛唐诸君子之作。	《东里文集》卷五《玉雪斋诗集序》
黎充煇	清新雅则,有唐人风致。	卷八《黎氏倡和诗序》
陆闾	其文章长于诗,古体宗魏晋宋,近体主盛唐,兼工书法,极力钟元常、王逸少父子。尝曰:“去此非第一义”。	卷九《跋与友兰生往复诗后》
曾荣	赋咏之体,必律唐人。	卷十四《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读学士赠嘉议大夫礼部左侍郎曾公墓志铭》
解缙	公之文雄劲奇古,新意叠出,序事高处逼司马子长,韩退之;诗豪宕丰赡似李杜。	卷十七《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参议解公墓碣铭》
罗性	盖先生学甚博,为文章切深,诗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书法钟元常。	卷二十二《罗先生传》
梁兰	为文简而婉,诗驰骋魏晋,而冲淡自然,有陶靖节之趣。	《东里续集》卷三十九《梁先生墓志铭》

是故,作为一个整体的诗歌时代的宋诗,在台阁体盛行的明前期,并未因宋儒在发明圣贤道心上的绝对理论优势和在俗世的精神指导地位以及宋文的跻身文统而得到相应的尊重。固然,宋儒之诗在理学界影响很大。邵雍式的性气诗,有理学家也喜欢偶尔写作,甚至出现了以陈献章、庄昶为首的性气诗派。对朱熹的《感兴》二十首,人们更是极尽夸扬,誉为“融畅天人,权衡经史,以性命奥学寓于音节韵度中,较之《古诗十九首》、陈拾遗《感遇》,理致悠深,气格苍古,直可追逐风雅,是又诗之一助也。”^[16]《卷十六《诗盟记》》方孝孺称为删后一诗^[17]《卷四《读朱子感兴诗》》,刘履《风雅翼》为作“郑笺”。而且这种赞誉有时溢出了理学界,延伸至诗话类中,对其特别表彰。但这些都可是靠了明代理学意识形态的帮忙,实在只是一种空头崇拜。而作为宋诗主

体的文人诗、诗人诗,难有这样的佳运。

三

两个时期的台阁作家的宋文观和宋诗观确实存在着程度不等的错位,对此如何解释?

就他们都尊崇宋文而言,尚易理解。在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受到统治者大力提倡的明前期,有着浓厚理学思想的明初台阁和集理学、政治、文学三位一体的典型台阁,自会有鲜明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在此观念下,以义理阐明圣贤之蕴的宋代理学家和以文辞发挥圣贤之学的宋代古文家自要受到推崇。加上从元代延祐到明的科举考试特别是试八股的推行,使得文坛从元代中期以后就有浓厚的崇宋文风气。而以欧阳修为首的宋文又在政治和道德的强势话语解读下成为风格雍容婉顺的代表,成为政治和道德的辅翼。

相较而言,明初台阁特别是金华学派尚给宋诗特别是朱熹诗留下了一席之地,与其宋诗观的错位尚不太严重。除前文提到的原因外,也许还与他们不顾诗文道分的事实而一再强调“诗文本出于一原”的观念有关。宋濂《题许先生古诗后》说:“诗文本出于一原。诗则领在乐官,故必定之以五声,若其辞,则未始有异也。如《易》《书》之协韵者,非文字之诗乎?诗之《周颂》,多无韵者,非诗之文乎?何尝歧而二之?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自此说一行,仁义道德之辞,遂为诗家大禁,而风花雪月之章,流连于海内矣。不亦悲乎!”^{[13](卷十二)}宋濂以韵来区分诗与文,举诗有无韵、文时有韵来证明诗文相通,有很强的以文(儒道)统诗的意味。刘基也说:“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无异也。”^{[4](卷五《苏平仲文集序》)}方孝孺进一步把诗归宿于文之明理载道中。其《刘氏诗序》言:“人不能无思也,而复有言,言而中理也,则谓之文。文而成音也,则谓之诗。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诗也。”^{[17](卷十二)}《时习斋诗集序》也说:“诗者,文之成音者也,所以道情志而施诸上下也……大而明天地之理,辩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汇纲常之正者,诗之所以为道也。”^{[17](卷十二)}其所谓的诗文都是“理”或“道”的载体,从功用上将诗文统一,理学色彩比乃师宋濂更浓。既然他们都强调理道对诗文的本原意义和写作的积养基础,则对宋诗尤其是讲道论性的理学诗自也不会如世间诗人那

样绝断,何况中间还掺合了他们不容易绕开的朱熹?当然,他们的肯定也是有限度的,也很难彻底摆脱流行世间的斥宋论调,所以他们在肯定时也要用汉魏晋唐来指出宋诗的不足。

那么,典型台阁何以对宋诗就或漠视或否定呢?原因很多,这里讲三点:其一,受明初以来普遍的崇唐抑宋风气影响,他们已有了借学唐而追古的思维和古体宗汉魏晋近体主盛唐的实践。金幼孜《吟室记》说:“夫诗自三百篇以降,变而为汉魏,为六朝,各自成家,而其体亦随以变。其后极盛于唐,泐泐乎追古作者。故至于今,言诗者以为古作不可及,而唐人之音调尚有可以模仿,下此未足论矣。”^{[18](卷八)}揭示了时人借学唐而追古的诗学策略。杨士奇《题东里诗集序》更有以《诗经》为“诗之源”,以《楚辞》、汉魏晋和盛唐李杜诸家为“诗正派”的“泐流而探源”的诗学追求^{[12](卷十五)}。通过上表杨士奇的记载,又可知阁臣虞谦、解缙、曾棨等有弃宋的诗法实践。所以刘鏊《赠翰林修撰罗先生序》说馆阁中人“为诗若文必韩、柳,必李、杜”^{[19](卷十)}。

其二,他们虽也有浓厚的理学思想,但同时又有着本质的诗歌“鸣盛”和“鸣治”意识,即能与政治的强盛祥和局面相配合的能为唱赞歌的诗歌功用观,而能符合这一要求的,是国势、人才和诗歌都盛的盛唐诗。杨士奇《玉雪斋诗集序》云:

《诗》以理性情而约诸正,而推之可以考见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若天下无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发而为治世之音,则未有加于唐贞观、开元之际也。……诸君子清粹典则,天趣自然,读其诗者,有以见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诗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14]。

按杨的阐释,盛唐诗的可贵有两个要点:第一,它是贞观、开元大好政治局面的反映,是值得表彰的“治世之音”;第二,其风格能与“治世之音”的要求配合,后人藉诗观志,“有以见唐之治盛”。前者是将作者的志意政治化,后者是将作品的风格雅正化,是典型的“声音之道与政通”思维。在典型台阁这个阅读主体超强的意图作用下,盛唐诗不可避免的单一化,都有“和平易直”的诗心和“清粹典则,天趣自然”的诗美。这种显而易见的“误读”,暴露的正是其台阁身份。

其三,或许还与朱熹对宋诗的偏见影响有关。朱熹论诗为台阁作家所推崇,杨士奇《胡延平诗序》称:“昔朱子论诗必本于性情言行,以极乎修齐治平之道,诗道其大矣哉!盖自汉以下,言诗莫深于朱

子。”^[14]这还是本于政治和理学身份。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在引了朱熹《答巩仲至第四书》说:“呜呼!学诗之法,子朱子之言至矣尽矣,有志者勉焉!”^[20]这就是本于诗学了。朱熹该信有何主张呢?从诗歌史来说,实质只有半部,从《诗经》到唐就结束。更重要的,他还有“三等”说,还有“诗之根本准则”和“羽翼舆卫”的划分,其间皆无宋诗;对不合其主张的,他说:“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意思,则其为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21]《卷六十四》这无疑又宣告了宋诗的死刑。再加上他的其他各项关于宋诗的臧否,不难见出其远宋的评论姿态。因此,严格信奉程朱理学的典型台阁作家,怎不有看似奇怪的漠视宋诗而古体尊汉魏晋近体崇唐诗的态度,而与其宋文观错位严重?

注释:

- ① 李东阳《倪文僖公集序》说:“自高皇时,宋学士景濂诸公首任制作,而犹未得位。文皇更化,杨文贞公亟起而振之。天下之修养涵育,以暨英庙,富庶之效,可谓极盛矣。”见《李东阳集》卷二,岳麓书社,1985年。
- ② 在《平湖集序》,刘克庄对宋文持正面的肯定态度。另参其《何谦诗集序》称扬“风人之诗”而鄙薄“文人之诗”。
- ③ 从宋代兴盛的诗文功能分界意识当也与“错位”评价有关,俟专文讨论。
- ④ 萧鎡《石溪周先生文集序》,见《石溪周先生文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参考文献:

- [1] 刘克庄. 后村先生大全集[M]. 四部丛刊本,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
- [2] 金若虚. 溇南遗老集[M]. 四部丛刊本.
- [3] 宋濂. 宋文宪公全集[M]. 严荣校刻本.
- [4] 刘基. 诚意伯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5] 贝琼. 清江贝先生文集[M]. 四部丛刊本.
- [6] 朱右. 白云稿[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7] 王祎. 王忠文公集[M]. 丛书集成初编本,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6.
- [8] 胡俨. 颐庵文选[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杨荣. 文敏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0] 黄佐. 翰林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1] 真德秀. 文章正宗[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杨士奇. 东里续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3] 黄卓越. 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35.
- [14] 杨士奇. 东里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5] 周鸣, 周叙, 欧阳金. 诗学梯航[M]. 国图藏江西省图书馆静电复制, 1989.
- [16] 陶安. 陶学士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7] 方孝孺. 逊志斋集[M]. 四部丛刊本.
- [18] 金幼孜. 金文靖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刘崧. 古直先生文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济南: 齐鲁书社, 1997.
- [20] 吴讷. 文章辨体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30.
- [21] 朱熹.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 四部丛刊本.

On minister's viewpoint upon Song's articles and poetry

FENG Xiaol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ommunication,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222, China)

Abstract: The ministers' viewpoint upon the Song's articles and poetry is abnormally unbalanced. They applauded Song's articles because of their rationalistic confucian study and government. The minister writer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onfirmed Song's poetry partly because of their conception of "the root of poetry and articles is the same one". The typical minister writers either neglected Song's poetry or negated thoroughly because of their poetical practice, political status and Zhuxi's poetics guidance.

Key words: "unbalanced"; the minister writers; viewpoint upon the Song's articles; viewpoint upon the Song's poetry.

[编辑: 苏慧]